

## 解放阁就像顶着星星的圣诞树

“这座城市有众多的泉眼，清澈的泉水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流淌出来。众多的泉水汇成小溪，几乎从每一条街道旁流过。”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1926年出版的《中国心灵》一书中这样描述济南，并称她是“最洁净的城市之一”。

但现在，老外们有些无法容忍济南的空气。韩国小伙崔景德模仿自己刚下飞机的样子，捂住鼻子咳嗽了几声，爱尔兰人乔治连连摇头，缅甸姑娘朴韵接连说了几遍“不太行”……

崔景德与济南结缘是在八年前，那时他18岁。有“前瞻”眼光的父亲认为中国前途宽广，建议崔景德来中国发展。那时候，崔景德的内心有着说不出的排斥，“又脏又乱，空气还不好”是崔景德起初对中国的全部印象。

2009年，作为交换生，20岁的崔景德来到了济南，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攻读本科。刚到中国的崔景德最痛苦的就是认汉字，他经常拿起中文书，

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发现自己把书拿反了。

在山大读大一的时候，崔景德交了一张只有三个字答案的试卷。“那三个字是‘对不起’。”崔景德说那时候汉字就像长了腿，结果老师也回了三个字给他：“明年见”。经过努力，大二的学期末，崔景德已经能够跟中国学生一起参加期末考试了。

初到济南，崔景德说他最奇怪的是怎么中国人都喝热水，这在韩国是不可能的，而且中国人大爱喝茶了。崔景德经过认真观察得出结论，济南的老年人身子骨硬朗，“清晨锻炼和晚上的广场舞对身体很好，再说中国人经常喝茶，老了之后也很少有驼背的。”

济南的山水非常可人。在济南生活了两年的爱尔兰人乔治第一次去趵突泉时，看到一股股喷涌的泉水，瞬间“惊呆了”，他呆呆地看了会儿，突然明白了济南为什么叫泉城。他很想用汉语表达自己的激

动和感慨，可是“中国话的四个语调就有些难把握，而且济南话跟普通话发音还不一样”。

山大经济研究院的外教菲律宾人凯文也不大会说汉语，却喜欢到处逛，凯文把解放阁形容成松树，一层层的屋顶是枝干，“晚上的时候，整个建筑像一棵顶着星星的圣诞树。”

朴韵则最喜欢去黑虎泉边看人们取水，她说家乡缅甸也有泉水，同样有赋闲在家的老人取了泉水回家煮了喝。

在智利人阿诺的眼里，济南是个“保持着中国传统风格”的城市。每当走在曲水亭街的青石板上，看到河边浣衣的妇女，半掩着的屋门，还有河对岸安静雕刻的老艺人，阿诺就会觉得时间慢了下来，仿佛回到了过去，“那里是最老的济南城，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历史，当看到那些窄窄的巷子 and 一户人家时，我好像触摸到了济南的历史。”

# 老外看济南 时光慢悠悠



山大历史学院留学生阿诺在教留学生打太极。



崔景德觉得摆剪刀手太单调，随手拿起从韩国运来的化妆品展示。

想了解中国文化的，去北京；想赚中国票子的，去上海；想创业投资找项目的，去深圳。对老外来说，济南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有点“鸡肋”，文化、票子、机会这里都有一些，却都没有多得让人垂涎三尺。

有些老外是被“请”来的，有些是被“骗”来的。无论他们是为什么来到济南，来了之后，就都有点不想走了。济南，有山有水有人家，日子过得不快也不慢，保守中还透着股子冲动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许亚薇 实习生 王剑秋

## “我去七里堡批发市场买菜”

“来济南一年胖三斤。”每逢周末，平时自己做饭吃的朴韵就要进行大采购了。朴韵对山大附近的水果摊和菜市场“门清儿”。“七里堡蔬菜批发市场，我去那里买菜！”

“我今年去过一次北京，但是北京外地人太多，有点乱，回到济南，我就觉得很舒服。”朴韵俨然一个地地道道的济南人样子。认可济南舒适的，还有刚果的麦乐龙。在北京语言大学读过一年预科后，麦乐龙来到济南。“济南没有北京繁华，没有地铁，没有太宽的马路，但是这里的生活非常舒服，物价也不高。”麦乐龙济南话说得不错，知道“杠赛来”，一说起这个，他就晃动着黑色的大脑袋，笑得前仰后合。

老外们最爱聊的，还是济南的“吃”。不同于南方菜的小巧精致，也不同于东北菜的粗放，鲁菜有着自己独特的味道。

崔景德刚来济南那会儿，对济南菜的印象是“油油的，脏脏的，看到就想吐”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跟着朋友走到一家卖黄焖鸡米饭的馆子门口。“那一天，我疯了！”这以后，崔景德就说这句话。而且每逢下雨天，崔景德都要拉上朋友去吃黄焖鸡，在崔景德看来，这是下雨天最适合的食物。“对了对了，还有把子肉，那种肉片，吃到嘴里快化了……”崔景德经常陶醉在把子肉的世界里不能

自拔，常常为身在别的城市吃不到把子肉而苦恼。在渐渐爱上中国菜后，崔景德毅然决然地同吃了十几年的家乡泡菜说byebye。

谈到吃，爱尔兰人乔治第一反应不是食物，而是“餐桌上的礼仪”。乔治说：“我喜欢跟中国人聊天，但中国人的饭局规则实在太复杂了。”不过乔治对济南的水饺情有独钟，每到一处饭馆，总会喊着“给我一盘水饺”。

不光乔治，朴韵和阿诺都喜欢包饺子，朴韵甚至把中国饺子发扬光大，填入了缅甸味馅料。阿诺虽然不会包饺子，但他吃饺子绝对讲究，必须用山西的老陈醋搭配山东薄皮大馅的水饺，同时要就着大蒜吃。因为受到教他功夫的中国师父李书峰的影响，阿诺还爱上了煎饼卷大葱，“第一次吃大葱感觉很辣，辣哭了，煎饼也咬不动，但是越吃越上瘾！”

每当馋虫上脑，麦乐龙就会独自一人或邀三两好友去芙蓉街搜刮一番。跟崔景德一样，第一次去芙蓉街的麦乐龙觉得眼前的“美食”难以下咽，但很快麦乐龙就爱上了芙蓉街的小吃，一段时间不吃就馋。现在，麦乐龙俨然芙蓉街的活地图，谁家东西好吃有滋味，他最清楚。夏天，麦乐龙还会和朋友一起坐在街边喝啤酒“撸串”，“经七路的饮虎池那里。”麦乐龙甚至能清楚说出回民小区的位置。

经理，并帮他照看“微店”。

麦乐龙喜欢旅游，去过不少城市，他最爱济南的，是作为黑人的他从未遇到上下打量的目光，也未遇到过因语言交流不畅而拒绝指路的情况。有一次，麦乐龙从洪家楼打车到山大北路，因为双方都没有零钱，出租车师傅只收了他三块钱，那天麦乐龙觉得自己特别幸运，“我遇到了中国好司机”。

麦乐龙、阿诺和崔景德来济时间较长，在与他们的交谈中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济南的感情，这种感情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，用阿诺的话说在济南很踏实，用崔景德的话说在济南很舒服，用麦乐龙的话说济南是自己的家。“在我们的国家，每个人就像一只鸟，而我这只鸟飞到了济南，也愿意在济南繁衍生息。”

(上接B03版)

## 称学生“老弟” 没啥特别

不过，书信用语也会因身份和关系的不同而不同。

彭林说，比如对老师、长者的提称语，要用尊鉴、道席，父母则要用膝下，同辈、晚辈用台鉴、青览，而慧鉴、芳鉴，则专用于女士。祝愿语和署名要与此相配套。比如前辈老师，祝愿的时候要用“文安、撰安”，署名用学生、门生、受业等。在落款中，对长辈要用叩禀、敬叩、拜上，对平辈则是谨启、鞠躬、手书，对晚辈则用示、白、谕。

“不同的语言，要明确场合和特定的关系，用错了反而是不尊重。”杜泽逊说，比如“足下”一词，就用于同辈或者晚辈。“顾随是叶嘉莹的老师，他在给叶嘉莹的信中，就称她为足下，然而叶嘉莹回信自然不能用这个词，要用先生。”

从书信用语中，还可以看出关系的亲疏远近。彭林说，在师生关系中，如果对方不是自己的亲学生，写信要称对方为兄，要是自己曾亲自授业的学生，或者关系较近的，则称之为弟。

“比如清末状元，曾经的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，给当时山东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季羨林送了两个礼物——扇面和对联，在题名时，称其为‘羡林老弟’。”杜泽逊说，有人就借此大做文章，认为王寿彭对季羨林多么好。“其实这个称呼没有别的意思。”

杜泽逊说，山东大学附属中学是山东大学的一部分，王寿彭任校长，季羨林自然是他的学生，称“弟”合乎情理，而且在当时社会，“老”就是“小”的意思，称季羨林是“老弟”，就是“小徒弟”，没什么不妥。

“所以，书信用语本是表达尊重，但是一定程度上，则表示了见外的关系。”

## 都变成了“同志”

“随着社会发展，各种不同的称谓都被一个词冲击了，那就是‘同志’。”杜泽逊说，“同志是一个通用词汇，比如有一次有人邀请我去开会，在注意事项的末尾，留了一个联系人的人名和电话，在不知道对方性别、年龄的情况下，称同志较为稳妥，而过去，缺少一个这样通用的词汇。”

杜泽逊说，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，再到社会主义，都讲究平等，而体现等级关系的书信用语，则慢慢被淘汰。

后来，同志这个词也发生了变化，原来党内共事的都可以称同志，现在同志只是同辈间的，称上级别则要加上官职。

“文化称呼正在一点点流失，这是非常可惜的，当然，把民国、清代的称呼放到现代，也很难完全合拍。现在很少有人称呼自己的丈夫为郎君，儿子称父亲则使用‘爸爸’，而不是‘父亲大人’。”虞云国说，现在撰写书信，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。“比如给文学界或者编辑写信，还是用古典的书信方式，给其他朋友写信，就用白话文。否则，别人会说你酸溜溜的。”

对此，杜泽逊也有同样的感慨，但杜泽逊认为，有些新词汇，还是有古意的存在，“就像女士、男士，是中西结合的产物，士在传统意义上指代知识分子。再比如先生，有‘闻道有先后’的意思，指对方比自己学问高，哪怕是小男孩，也称先生，跟古典书信用语谦虚的意思一脉相承。”

虞云国认为，作为蕴含着意蕴的国粹，一些传统书信用语可以保留。“历史和文化不能割断，这是礼仪的反映。”杜泽逊说，现在整个社会都在提倡儒学，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正是儒学的体现，在这种大环境下，传统的书信用语应该有必要有选择地回归。